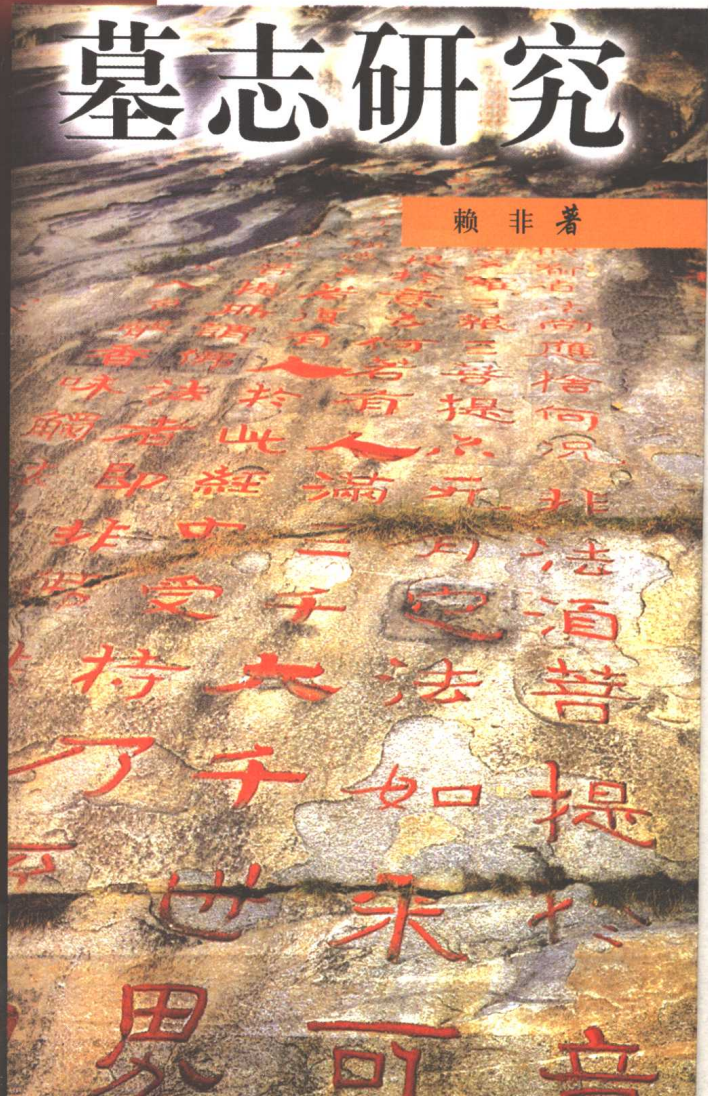


《齐鲁文化学术文库》

齐鲁碑刻

墓志研究

赖非著



齐鲁书社

齐鲁文化学术文库

齐鲁碑刻墓志研究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齐鲁碑刻墓志研究/赖非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3. 12

ISBN 7-5333-1259-7

I. 齐… II. 赖… III. ①碑刻-研究-山东省-秦汉时代
②墓志-研究-山东省-汉代~唐代 IV. K8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3100 号

齐鲁碑刻墓志研究

赖非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32 开
印 张 12.125
插 页 2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200
标准书号 ISBN 7-5333-1259-7/K·368
定 价 25.00 元

《齐鲁文化学术文库》编委会

学术顾问：安作璋

主 编：王志民

副主编：魏 建 朱亚非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谱写出了无数的灿烂辉煌。诞生于先秦时期齐鲁大地上的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齐鲁大地上涌现出了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军事家、科学家和学者，他们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通过自己的勤劳、聪明和智慧，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齐鲁文化，涌现出了以孔子、孟子及其儒学，孙子及其兵学，邹衍及其阴阳五行学，管子及其学说等为代表的各种学派。齐鲁文化历经千年而长盛不衰，成为中华文明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曾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对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仍然有很好的借鉴与启迪作用。研究和探讨齐鲁文化，使之古为今用，是我们今天义不容辞的责任。

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以深入研究、探讨和弘扬

齐鲁文化为己任。《齐鲁文化学术文库》是齐鲁文化研究中心设置的系列重要研究课题。其内容涵盖齐鲁文化研究的多个层面，除了理论研究以外，也包括应用性的研究。承担《文库》中各书的作者，都是在齐鲁文化研究方面卓有成效的专家、学者。他们中既有学识渊博、造诣深厚的老一辈学者，也有朝气蓬勃、根基扎实的年轻一代学界新人。所列入文库的，都经过多位同行专家的审定，其内容不仅严肃、认真，而且具有创新性。但愿这一套《齐鲁文化学术文库》的出版，能为各阶层人士学习、研究和探讨齐鲁文化起到帮助作用，对齐鲁文化的发扬光大产生积极的效果。

《齐鲁文化学术文库》编委会

我国古代文化史上曾经创造了大量的石刻艺术品，它们对于古代文字、书法、绘画、雕塑、历史、文物、考古、科技等方面的研究，都是难得的珍贵资料。古代石刻历史悠久，上溯先秦，下至明清，遍布全国各地。就现存的文字书法刻石来讲，早期的（唐以前）作品以陕西、河南、山东三省最为丰富集中。陕西以唐碑称最，西安碑林所藏为其大宗；河南以北朝造像题记和墓志为多，龙门题刻、邙山墓志是其代表；山东地区的作品则以秦汉碑刻、云峰刻石、北朝佛教摩崖刻经最为著名，曲阜、济宁、泰安、莱州、东平、邹城是其集中之地。

和豫、陕二省相比，山东石刻的特点一是时代早、内容多，二是保存好、相对集中，三是个性突出、气魄宏大，因而自宋代以来就备受金石学家、书法家们的推崇。晚清学者们认为，北朝书法有三大宝库：一曰龙门造像，一曰云峰刻石，一曰邹县（现改为邹城市）四山刻经。龙门为方笔之极轨，云峰为圆笔之极轨，邹

县四山通隶楷、备方圆，为榜书之宗。这里所说的三大宝库，有两处在山东，如果再加上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秦汉碑刻，史料价值与书法价值俱佳的名门望族墓志，足可见山东文字书法石刻资料的地位之高了。

秦汉碑刻是山东地区书法石刻资料之一大宗，其数量约占全国总数的一半左右，尤其是秦和西汉的作品，更占有绝对优势。秦汉时期山东一带是全国重要的经济发展区，且又是传统文化非常发达的地方，因而有条件镌刻如此众多的碑刻。目前保存下来的有60多种，其中早年出土的30多种，新近出土的30多种，曾见于著录、原石已佚的65种。

关于山东秦汉碑刻的研究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晚清以前的金石学研究，一是近20年来文物考古学对碑刻的考察。前者最迟始于南北朝时期，宋代已发展成相当的规模，至清代金石学大盛，不仅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金石学家，还推出了令人目不暇接的研究文章和著作。这批人学识渊博，功力扎实，考据严谨，其成就令人敬佩。研究工作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有：第一，关于碑刻的出土、流传、鉴别；第二，关于碑刻文字的校读、考释；第三，关于与碑刻有关的典章制度以及人和事物的考证；第四，关于碑刻形制的演变和书法艺术赏评，等等。民国至20世纪70年代，秦汉碑刻的研究处于低潮。近20年来，由于全国文物考古和书法热的兴起，秦汉碑刻重又为学人及书法理论家们所瞩目，出现了一些很有分量的文章和著作。研究者不再就碑论碑，而是把碑刻放在社会大环境中，把它们看做是一定的文化意识的产物，其形成、发展都与复杂的社会紧密相连。显然，这是有别于旧金石学的一个崭新的观察点。

被清人称作北朝书法三大宝库之一的云峰刻石，是中国书

法史上难得的珍品。主持书写和镌刻这些刻石的郑道昭，曾被清人奉为北方书圣，与王羲之并驾齐驱。云峰刻石分布在莱州市的云峰山、大基山，平度市的天柱山和青州市的玲珑山上，共有北魏、北齐作品 45 种。在镌刻形式上，它们有三个特点：第一，跨越时间虽短，但数量很多，相互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第二，题刻体裁多样，有题名、游记、铭告、诗文、颂德碑，有四五字的简单题名，也有字逾千言的鸿篇巨制；第三，因是摩崖，四山又都是当地名山，题刻与自然环境相得益彰，有一种山林气、苍茫感。在题刻内容上，云峰刻石既反映出封建社会一位高层官僚仕途失意后颓丧无聊的复杂心态，又体现了胶东一带源远流长的道教传统。从艺术上看，云峰刻石总结了篆隶书以来，特别是北朝初期书法创作的经验，吸收了各种笔法的有益因素，摈弃了粗陋的野气，在魏碑书的创作上开创了新的领域。郑文公碑一类吸收了篆书笔画浑圆、骨力内含的特点，追求凝练典雅的风骨与神韵；论经书诗刻一类则较少保留古法，更多地去探索锐利飘洒的楷书特点；白驹谷题字则为方笔榜书做出了典范，它们既重视线条的力度与厚度，又重视线条“静”与“动”的和谐处理，应该说，不愧为北魏榜书的佼佼者。

云峰刻石的著录始于宋代赵明诚。清代乾嘉之际，研究工作推出第一个高潮，20 世纪 80 年代，考察研究进入了新的黄金时代。研究活动不仅有书论家、金石学家介入，文物考古工作者也参与了相关问题的探讨。人员组成不再限于国内，日本、韩国、美国及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也纷纷加入其中。研究手段也一改原先从拓片到拓片、从资料到资料的案头分析，而变为以田野实地考察为基础的综合研究。这样不仅大大提高了研究工作的科学性，同时，还把探索的视角扩展到了文

字、书法、历史、考古、宗教、思想、文学、鉴赏等领域。

泰峰山区的北朝佛教摩崖刻经，是山东境内又一著名的古代石刻群。它产生于北齐、北周时期，分布在于平阴县洪范东山、天池山、二鼓山、云翠山、大寨山，东平县司里山、洪顶山、银山，宁阳县神童山，汶上县水牛山，泰安市泰山经石峪，新泰市徂徕山，邹城峯山、尖山、阳山、铁山、冈山、葛山，滕州市陶山上。内容有佛经、佛名、佛号、偈语、题记。参与写刻活动的人物有高僧、比丘、佛弟子、善男信女，还有朝廷高官、王妃贵族、名门后裔、佛教管理人员等等。刻经字大如斗，书风亦隶亦楷，艺术特点非常突出，是中国书法史上少见的艺术形象，因而其意义是多方面的。从佛教史上讲，它反映了北朝后期佛教发展的一大特点；从书法发展史上看，刻经书法处处洋溢着变革的气息。它的基本框架是隶书，却又将魏书和篆书的艺术成分有机地融合进来，给当时滑向末路的隶书艺术注入了新的血液，为隶书艺术的复苏进行了有价值地探索。这些刻经历来被称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作品“若有道之士，微妙圆通，有天下而不与，征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气韵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绝”（康有为语）。且又衬之以山林峭壁，流水钟声，作品与大自然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其场面之博大，气势之恢宏，堪称书史上一绝。

山东出土的古代墓志，虽不能与洛阳邙山出土的元魏宗室墓志相提并论，但它们却也有自己的特点。尤其是北朝隋唐时期的地方望族墓志，更以其出土集中、彼此关系密切而对历史与考古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名门望族墓地及墓志的形成，是传统的聚族而葬的古老习俗在门阀世族社会中发展膨胀的结果。就其资料信息而言，它甚至可以被看成庞大的封建世族社会网络上的一个个钮节。近30年来，山东出土的北朝隋唐世族墓

志有：清河（今属淄博市）崔氏家族墓志、茌县（今属德州市）高氏家族墓志、泰山（今属新泰市）羊氏家族墓志、历城（今属济南市）房氏家族墓志、金乡（今属嘉祥县）徐氏家族墓志。此外，还有一些著名历史人物的墓志，如邹城刘宝墓志、淄博傅竖眼墓志、寿光贾思伯墓志、历城傅华墓志等，都是历史考古、文字书法研究不可多得的材料。

由于山东的绝大多数墓志出土较晚，所以研究工作目前尚未展开。不过我们相信，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这批重要材料必定会受到学术界广大学人的关注。

引言	1
汉代碑刻	1
第一章 汉碑的起源、形制与发展	3
第二章 全国汉碑分布	12
云峰刻石	21
第一章 云峰刻石的成因	23
第二章 云峰刻石的分布特点	28
第三章 云峰刻石的著录与研究	33
第四章 云峰刻石的艺术成就及郑道昭 在书史上的地位	58
第五章 云峰刻石的传拓	74
北朝摩崖刻经	85
第一章 刻经背景	87
第二章 刻经的起源、发展与分布	93
第三章 僧安刻经的相关问题	133
第四章 僧安书法的特色、成因与意义	178

汉—唐墓志	189
第一章 关于墓志的起源	191
第二章 山东墓志的出现与发展	203
第三章 山东汉—唐墓志分布	211
第四章 山东望族墓地及墓志考释	217
第五章 其他墓志考释	281
附表	343
后记	376

汉代

碑刻



第一章

汉碑的起源、形制与发展

碑是我国历史上珍贵的礼俗文化活动遗物。它自汉代出现，绵延两千多年，至今仍盛而不衰。碑文中蕴含的大量有关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礼制、地理等方面的信息，历来为史学家们探史、证史的第一手资料。依据内容，碑可以分为墓碑、功德碑、记事碑、典籍碑、造像碑、题名碑、宗教碑、地图碑、书画碑^①。这几类中，尤以墓碑出现时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遗存数量最多，故而我们谈碑的起源时，实际上是以墓碑为首要对象的。

一、关于碑的原始概念

古代典籍中关于“碑”的概念及用途，主要有

^① 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文物出版社1997年。

以下几种记载：

1. 《仪礼·聘礼》：“陪鼎当内廉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又，《仪礼·公食大夫礼》：“陈鼎于碑南。”“庶羞陈于碑内，庭实陈于碑外，牛、羊、豕陈于门内。”

2. 《礼记·祭义》：“祭之日，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郑玄注：“丽，犹系也。”《仪礼·聘礼》郑注也云：“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孔颖达疏：“君牵牲入庙门，系著中庭碑也。”

3. 《礼记·檀弓下》：“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郑玄注：“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绋绕。天子六绋四碑，前后各重鹿卢也。”（桓楹）斫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谓之桓。诸侯四绋二碑，碑如桓矣。”《礼记·丧服大礼》郑玄注曰：“……又树碑于圻之前后，以绋绕碑间之鹿卢，挽棺而下之。”

以上所摘第一类资料中的碑，是立在宫中用以“识日景”、判时间的装置，以石质或木质为之；第二类资料中的碑，是立在宗庙大门内拴系牲口的桩子，或石质或木质；第三类资料中的碑，是装置辘轳用以控制下棺的木柱，当为木质。三类碑中，识日景之碑不可能用来系牲，因为识日景务求准确，碑一旦系牲，难免晃动；二者更不可能借以下棺，下棺之碑需要粗壮，更要有一定长度。可见，古人虽将这三物统名曰碑，而事实上，它们不管是设置的位置、目的，还是用途、意义，均风马牛不相及。显然，周人对碑的概念含义是宽泛而模糊的。

周代以后，很长时间不见有人对碑进行义辨。汉许慎《说文解字》说：“碑，竖石也。”这一更加宽泛的说法，与郑玄对碑不加析辨的注解相比，使后人更加模糊了碑的内涵与外延。